

钱锺书为何不选《正气歌》

■徐友樾 晋世超



我们有幸读过许多钱锺书的作品，此文最是精妙。娓娓道来，言外有音，韵味令人琢磨不尽。

三、究竟为何不选

近时，关于钱锺书先生的研究方兴未艾，在“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”、“为什么留学未取高学位”、“为什么不去台湾”以至“不去美国”的诸多课题之外；又有人再次发表有关《正气歌》的议论，为《正气歌》落选而惋惜和鸣不平。理由不外乎两点：一、《正气歌》化用前人诗文，其蹈袭之弊及用典不当，是小瑕疵，尤其对烈士文天祥来说，应援引钱锺书之师陈衍石遗主张的“了解之同情”，予以宽宥；二、该诗作为文天祥的代表作，是其身世和气节的宣言书，缺一不可。又试着劝说选者“在用典时有时需关注典故产生一刹那所描述的状况和所表达的情感，不需将典故和历史真相乃至人物生平混为一谈。”既然有人主张对艺术本位“宽容”，为什么偏要使用政治标准来苛责已经作古的选诗者呢？看来我们还需要回归原点，从《宋诗选注》不选《正气歌》直接原因说起。

读者如果将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和介石《击蛇笏铭》相关语句同文天祥《正气歌》稍作对比，便不难看出《正气歌》和前面两篇文章的源流关系。说其“重复太甚，伤于蹈袭”以至“用典”不妥，十分中肯。文天祥连续列举了齐太史、董狐、张良、苏武、严颜、嵇绍、张巡、颜杲卿、管宁、诸葛亮、祖逊、段秀实12位所谓忠义之士，用以自况。钱锺书最反对

“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”流弊，《正气歌》这个带有普遍性的致命弱点，曾长期困扰古诗乃至整个文学研究领域。正如《宋诗选注》序言所写的：

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，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，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，是西昆体那“为什么不去台湾”以至“不去美国”的诸多课题之外；又有人再次发表有关《正气歌》的议论，为《正气歌》落选而惋惜和鸣不平。理由不外乎两点：一、《正气歌》化用前人诗文，其蹈袭之弊及用典不当，是小瑕疵，尤其对烈士文天祥来说，应援引钱锺书之师陈衍石遗主张的“了解之同情”，予以宽宥；二、该诗作为文天祥的代表作，是其身世和气节的宣言书，缺一不可。又试着劝说选者“在用典时有时需关注典故产生一刹那所描述的状况和所表达的情感，不需将典故和历史真相乃至人物生平混为一谈。”既然有人主张对艺术本位“宽容”，为什么偏要使用政治标准来苛责已经作古的选诗者呢？看来我们还需要回归原点，从《宋诗选注》不选《正气歌》直接原因说起。

根据《宋诗选注》的取舍标准：一、“押韵的文件”不选；二、“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”也不选；三、“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”不选；四、“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”也不选。《正气歌》的落榜，当是正常结果。

钱锺书把文天祥的诗分作前后两个时期，一是元兵打破杭州，宋帝被俘虏以前，认为“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”。二是文天祥从元兵的监狱里逃出来，直到再度被捕被杀。这一时期的诗歌“大多是直书胸臆，不讲究修辞，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。”《宋诗选注》共选了文天祥四首诗，《扬子江》一首属前期两篇文章的源流关系。说其“重复太甚，伤于蹈袭”以至“用典”不妥，十分中肯。文天祥连续列举了齐太史、董狐、张良、苏武、严颜、嵇绍、张巡、颜杲卿、管宁、诸葛亮、祖逊、段秀实12位所谓忠义之士，用以自况。钱锺书最反对

确评价，从正反两方面宣告了《正气歌》落选之合理。钱文字字珠玑，堪比飞天之舞，亦可称之为铁甲战车，无论是艺术趣味，还是学术结论，都深刻而扎实，给读者以启迪，同时也增加了选本的余味和可读性。

四、作者宿愿和努力

钱锺书不但是杰出的古典诗词研究者、编选注释者，同时也是优秀的古典诗人。我们翻开仅存百首的精选《槐聚诗存》，可以说是走进了古典诗歌的艺术殿堂。1991年，作者已宣布封笔不再写诗，却又作《代拟七首》，堪称“况古昌今，无出其右者”。他不会容忍全无创新性的文学作品。他写道：“倘仅以‘曾使人歌使人语’者为文学，而不求真价所在，则‘邻猫生子’之消息，皆可为‘黄绢幼妇’之好词矣。”早在23岁时，他在文章中就称“文学非政治选举”，也证明“文学标准”，不同于“政治选举”，也不同于“骨董之结习”。先生又举过一个有趣的例，谓“牛羊犬马各有专家，独猪从无人画者。”可谓聪明幽默的人文发挥，可惜没人作专题研究。而钱锺书在《模糊的铜镜》一文中，曾经预见《宋诗选注》未来命运：

它当初不够趁时，但终究免不了也付出趁时的代价——过时，只能作为那个时期学术风气的一种文献了。假如文坛算得时代风貌和作者思想的镜子，那末这本书比不上现在的清澈明亮的玻璃镜，只仿佛古代模糊黯淡的铜镜，就像圣保罗的名言所谓：“镜子里看到的影像是昏暗的。”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“正确”指导思想，也不爽朗地显露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。也许这个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。

以学术为理想追求的钱锺书先生，从来不会放过任何擦拭铜镜的努力。据我们大致统计，《宋诗选注》从初版至今，至少有7次重印。此外，还有多种译本和新排本，其间他多次想迁就出版商，却又忍不住手痒，遂干脆把能修改的内容堆积在书后，以致到他生前最后一版，才得以统一排入。这些事实均记录在《宋诗选注》近百页印数的各种版本之中。这些变化修改，并未引起研究者兴趣，其中先后多次删节

了初版中刘敞的7首，邵雍的一首等5个人的全部诗作；增加诗人柳开、晏殊、刘敞、徐俯、江端甲战车，无论是艺术趣味，还是学术结论，都深刻而扎实，给读者以启迪，同时也增加了选本的余味和可读性。

几经修正洗拭的铜镜，是否还会像《模糊的铜镜》所写的“历史的进程里，过去支配了现在，而历史的写里，现在支配着过去”呢？显然，过去应该支配现在，今天，哲人已逝，谁也不必再说假作者，要受现在的支配，再选《正气歌》《过零丁洋》了。值得读者关注的倒应该是：该选本出版半个世纪以来，《宋诗选注》一直受到读者喜爱，出版社每次重印，等于是为作者提供时空和机遇，出入围城，增删变化，一步步地逼近“清澈明亮的玻璃镜”。其间恐怕也因客观环境所限，仍有先生喜爱的诗作甚至诗人没有入选。我们相信，古人的诗作，有先生评价在，有评选的原则存，“铜镜”自然会一天天明亮起来。

五、袅袅余音

钱锺书先生最终对自己的选本是否满意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，我们可以推见，他40年间不间断地修改，但总又略感不足。假以时日，还会修改，还会补充。但绝对补不到《正气歌》。可以说钱锺书一生诸多事实，都大于不选《正气歌》这个小例子。我们不应把那些“惹是非”和“找岔子”的旧话，再说再论个没完没了。

目前有关钱锺书的深入研究不多，非遗闻轶事的课题更为罕见。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：钱锺书先生一生致力中外文化研究，有哪些建树？多少的重大成果是什么？其中有多少是承袭了前人的，又有多少是创新的？究竟有多少内容尚未被我们认识？钱锺书先生既定的学术目标，还有哪些应该大力推进？

总之，围绕《宋诗选注》的大事件和小材料，都证明钱锺书先生为学精深博大，而对其治学之道的探究，标志着学术环境在进步。

当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，觉得有些可笑，因为它在逻辑上矛盾，又于情理不合。好比在市场购物，你买了白菜，却有人质问你为何不买萝卜，陷人于无词辩白的窘境。

一、事件的背景

1957年6月，钱锺书开始编著《宋诗选注》。据说这是个领导指定的规划项目，但从未见有人披露其立项、成稿过程。那时宋诗远不及唐诗热门，宋诗数量浩繁，研究又几乎是空白，要做这个项目工作量极大，对学术水平要求极高。该书1958年9月一经出版，即被定为文学研究所一杆“白旗”，其间委曲肯定不会为外人所知。后辈晚生一再寻访，方知未选文天祥的《过零丁洋》和《正气歌》则是该白旗案的“主案由”，选宋诗不问那两首，简直就是触犯了天条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公开出版的《院史》，起自社科院正式成立的1977年5月，关于“哲学学部”，未有记录。但在“内部印行”并由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”公开出版的《文学所志》120页上却有如下记载：1958年9月14日出版的《文学遗产》发表批判郑振铎文章，认为郑的学术成果乃“彻头彻尾的伪科学”，“反动的世界主义”，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化服务”，“成为统治阶级斗争的工具”等等；“学部响应号召，开展白旗运动，对郑振铎、孙楷第、钱锺书、杨绛、李健吾等人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”。

再沿《文学所志》向下读，“十月八日，郑振铎在学部召开的学术批判会发言，回顾检讨自己的一生”原书此处有小注说：“参见郭东的《最后一次讲话》”。接着写道“这次批判会持续多人（原文如此）批判对象除郑振铎外，还有钱锺书……”

历史如戏，总有剧情般的偶然转折与巧合。九天后，“十七日，郑振铎出访阿富汗”十八日，因飞机失事在苏联上空遇难”。当时多人回忆烈士的文章都有他在行程中写作的记载，料想少不了书写自我批判的文稿。结果，批判会改成追悼烈士的大会。接下来，文学所从北京大学迁往建国门海军司令部大院，又经大炼钢铁、农业大跃进等一系列事情，几个月内视线多次转移，披白旗的烈火渐渐转弱。1959年6月，时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何其芳顺应形势，虽然对钱锺书等的批判，既没有撤销，也没有

纠正，但批判从社会级、学部级、研究所级降低至组室一级。1959年7月后，何其芳又被迫忙于检查“右倾”，不得不转向黄克诚夫人唐棣华的“李清照研究”开炮。至此，披白旗运动不得不暂时让路。文革中，借批判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，曾老调重弹，再次举出《宋诗选注》《正气歌》旧证，还掺入一个“攻击领袖”大谣言，音阶一下子提高八度，钱锺书的“白旗”名衔便被升级为需要批臭打倒的反革命分子了。文革十年，钱锺书目不旁鹜，完成学术巨著《管锥编》，交出一份史诗般的答卷。他曾以自己的诗作概括道：“世途似砥难防算，人海无风亦起波”，“四劫三灾次第过，华年英气等销磨”。

明明是一个正常结果，为什么已经被多次批判，甚至在钱先生过世多年之后，学界还会有人指责或曰劝进，希望能在《宋诗选注》中加入《正气歌》呢？

二、先生自己说

或许，钱锺书先生对此早有预料。《宋诗选注》初版三十年之后，彦火（即著名文学家潘耀明先生）敏感地捕捉到文情，欲印行该书的香港版，他特邀钱锺书再写了一篇序。钱先生在文章开头便说，“这本书在一九五八年出版，受到一度公开批判”。接着以特有的钱氏幽默和许多轻快的揶揄，带出一个沉重的旧话。该文在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转载时，作者又做了稍许修改，并重新冠以醒目的标题——《模糊的铜镜》。现依最新版摘抄如下：

这部选本不好；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，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。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。不过，一切这类选本都带着迁就和妥协。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、理事等，有“终身制”、“终身制”。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，你若不选，就惹起是非；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，要是你不选，人家也找岔子。正像上届的会长和理事，这届得保留名望；兄弟组织的会长和理事，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装点或“统战”。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出现。评选者的懒惰和惰性或势利，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诗名。这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小因素，也是文艺社会学里一个有趣的问题。

林冲刺配沧州地名漫论

■王立成

一部《水浒传》使沧州（在今沧州市旧州镇，非今沧州，今沧州古称长芦）扬名于世，众所周知沧州被记述于书中则和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、武师林冲有关，即林冲逼上梁山的故事梗概，详见《水浒传》第八回至第十回。

关于野猪林和草料厂及山神庙，沧州学者考论的文章很多，但论证较为驳杂，说法也多有谬误，甚至互相抵牾。如南皮赵树森认为野猪林当在今南皮县的东、西林子村（赵树森《野猪林》与东、西林子村》，2016年6月21日《沧州晚报》人文版），东光有学者则认为在今东光县南霞口镇鹿林村。草料厂的位置李兆新提出在今海兴县马厂村，而山神庙在海兴县马厂村东10公里的小山之下（李兆新《草料厂》与马厂村》，2016年9月9日《沧州晚报》人文版）。

先说野猪林。野猪林是一座“猛恶林子”，乃是杀人放火、打家劫舍的好去处，董超、薛霸选在此下手有以下考量：一是文中指出“此是东京（北宋首都，今开封）去

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去处”。二是陆虞候在董、薛二人押解林冲出东京时特别交待：“望你两个领路，不必远去，只就前面僻静去处，把林冲结果了，就彼此讨纸回状，回来便了。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野猪林距离开封并不遥远，而且战略位置险要。另外董超、薛霸二人在野猪林下手的前一天，因炎暑正热，林冲又蹇足难行，薛霸于是借口怕误了行程而埋怨道：“好不晓事，此去沧州二千里有余的路，你这般样走，几时得到？”当日晚上夜宿没有前行，第二天早起先走了二三里，林冲因脚磨破化血捱不动时，后在薛霸的谩骂和威吓之下“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”就到了野猪林。以上可知野猪林并不在沧州境内，甚至不在河北省内，而且二者离得特别远，即使薛霸路上迁怒于林冲而故意夸大道路迢迢，但也在千里之外了。

野猪林不在沧州境内，那草料厂和山神庙又在何处呢？林冲到达沧州后因柴大官人相护并不

曾受多大刁难。但好景不长，陆虞候和富安追至而来，设计让林冲去守草料场以便纵火凶致其于死地。文中写道，到第六日，只见管营叫唤林冲到点视厅上，说道：“你来这里许多时，柴大官人面皮，不曾抬举的你。此间东门外十五里有座大军草场，每月但是纳草纳料的，有些草例钱取觅。”按照此种语言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大军草料场在沧州（今沧州市旧州）城东门外十五里地处。此间距离甚好，既能方便城内军马后勤所需，又能避免过远则远水不解近渴，过近则因城市人员聚集繁杂不安全，当然选址还有草料原料供应的考量，也就是一般都选在乡民集中地，而不是城市辐射区，这样更好地方便乡民“纳草纳料”。而沧州（旧州镇）至李兆新《草料厂》与马厂村》文中所提的海兴马厂村有百里开外，不要说与文中的十五里相差甚大，就是单作为军事重镇沧州的草料场距离也太远了些吧？

另外他还提到山神庙在马厂

东10公里外的小山（亦称马驹山）之下，但老军和林冲交接时曾提醒林冲，说道：“你若买酒吃时，只出草场投东大路去，三二里便有市井。”这里的“市井”当指的是市井人家，也就是一个要道路边经营小饭店的人家，而不是城镇聚集商业点。后林冲去此处沽酒路经一所古庙也就是山神庙，“那雪正下得紧，行不上半里多路，看见一所古庙”。此庙距大军草料场只有半里路，何来李兆新20里之说，即使从旧沧州到山神庙也不到10公里，细算来也就是15里半的路程。后林冲因雪大压坏了草厅的居处，想找个落脚点，再次想起：“离了这半里路上，有个古庙，可以安身。我且去那里宿一夜，等到天明，却作理会。”借林冲之口再次点名了山神庙与草料场之间只有半里之遥，言外之意。

《水浒传》中出现地许多古地名的描写毕竟是小说家之言，至于真假还有待考证，切不可处处当真，对号入座，否则就有演义的成分。譬如，书中第八回：“林教头刺

配沧州道，鲁智深大闹野猪林”的“沧州道”的行政称呼就值得商榷，因沧州在历代从没有被置过“沧州道”，道本是唐朝的行政区划，宋虽有，但不久后统治者汲取唐藩镇割据的教训将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，变为路州县三级制，到林冲所在的宋徽宗时期早已“路”行天多年了。有人认此出所谓“道”应该是指道路（见王敏之《狮城探秘》第152页），但笔者实不敢苟同。从书中的章节安排和题目的对应上就可以看出此道非道路，而应是一行政区划。第十回是“林冲发配沧州道，鲁智深火烧草料场”，沧州道对应野猪林，山神庙对应草料场，都是地名，尤其是刺配地应该为沧州城，而不是强调去沧州发配的路上。再譬如山神庙的旧沧州周围是平原地带，并无山林，如真实应对，这山神庙出现的就太过突兀，甚至让人误以为作者写错，但放在小说情节的设计情境中则是神来之笔，颇具画龙点睛之感。山神庙一方面突出了神，一方面强调了山，二者的关联

深化了小说对林冲命运安排的营造。神是庇护虔诚者，意味着林冲能逢凶化吉。途中看见一所古庙，林冲顶礼道：“神明庇佑，改日来烧纸钱。”不久林冲避居庙中躲过致命大火，又在庙中杀陆虞候等三人，大仇得报，真可谓：“天上有神灵，善恶自有报”。这也反应了当时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宿命轮回的朴素唯心观，使人读来更具有了人间香火的味道。从书中的章节安排和题目的对应上就可以看出此道非道路，而应是一行政区划。第十回是“林冲发配沧州道，鲁智深火烧草料场”，沧州道对应野猪林，山神庙对应草料场，都是地名，尤其是刺配地应该为沧州城，而不是强调去沧州发配的路上。再譬如山神庙的旧沧州周围是平原地带，并无山林，如真实应对，这山神庙出现的就太过突兀，甚至让人误以为作者写错，但放在小说情节的设计情境中则是神来之笔，颇具画龙点睛之感。山神庙一方面突出了神，一方面强调了山，二者的关联

概而言之，《水浒传》中对林冲刺配沧州古地名的记叙尤其是里程的算计有其独特之处，当经得起推敲。然小说毕竟不同于历史史实的记载，写小说自有其求神似形备之状而不必全真之志，采妙趣以引人而不拘于现实枯燥之窠臼，因而后来者且不可奉之为圭臬，作茧自缚，亦不能跳脱而为，断章取义，考据者当如是。